

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的影响

苏 超, 朱乐红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 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和林纾两位伟大的翻译家翻译目的、原著选择、语言运用以及他们的翻译方法的影响。阐明了严复和林纾翻译的社会效应, 即他们的译文对当时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新, 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反作用力。认为对译本的评论不可和这一译本产生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所决定的客观因素以及译者本人的主观意愿相分离。

关 键 词: 严复; 林纾; 翻译; 历史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5-0087-03

On the Influence of Specific Historical-Cultural Context on Yan Fu and Lin Shu's Translation

SU Chao, ZHU Le-hong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Yan Fu and Lin Shu are two major translators in China's modern period. This thesis intends to analyze the two great translators of Modern China from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It elaborates Modern China's historical-cultural context and illustrates its impact on Yan's and Lin's translations: their purposes of translations, their choices of the originals and their use of classical Chinese, their employment of such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s addition and deletion. Then this thesis focuses on influences of Yan's and Lin's translations, that is, the counterforce of their translations on the innovation of people's minds, on the promo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Yan Fu; Lin Shu; translation; historical-cultural context

严复与林纾是近代中国两位主要的翻译家。学者们曾对他们的翻译进行过大量的研究, 但大多是从传统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 而传统翻译理论是以原文为出发点, 强调文字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 很多关于严复与林纾翻译的评论都存有一定的偏见, 或者说不全面的。

严复在《天演论》的序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三字翻译标准, 但他自己却未在其翻译作品中遵循这一标准。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呢? 为什么严复在翻译过程中似乎只对自己负责? 同时, 林纾作为一位负责而爱国的翻译家, 曾与他人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 以开拓中国人的视野, 解放他们的思想, 但为何在翻译中他却任意删改原文? 人们该如何理解

他的翻译方法并给予正确评价呢?

20世纪70年代, 特拉维夫大学的佐哈尔教授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 并指出翻译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从此, 翻译不再仅仅处于语言的层面, “文化转换”开始在翻译研究中显现。理论学家开始意识到翻译不是存在于真空中, 而应关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赫尔姆斯发展了这一理论, 并提出“从译语文学角度看, 所有的翻译都会出于某一原因, 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操纵。”^[1]这一理论为研究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笔者将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出发, 从这一全新的角度研究其对严复与林纾的翻译目的、原著选择、翻译中古文的应用以及他们翻译技巧的影响。

一、对翻译目的的影响

翻译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 译者也不仅仅是原文的奴隶。翻译过程受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及译

收稿日期: 2009-09-21

基金项目: 湖南农业大学人才引进基金(06YJ35)

作者简介: 苏 超(1980-), 女, 湖南长沙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的研究。

者从自身的翻译目的出发而对原文进行的操纵。

近代中国是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期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进行了侵略。中日甲午战争和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进步的中国人从中国往日辉煌的旧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中国濒临灭亡,中国人也将沦为奴隶。因此,当时主导的政治意识是唤醒中国人民,赶走外国侵略者,以期重建往日的辉煌。严复和林纾是当时主要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目的当然与这一主流的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

严复清楚地知道自然科学与思想自由是使西方国家强盛的主要根源之一。为唤醒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统治阶级,严复选择了一些有关哲学、逻辑以及经济等方面的书籍进行翻译。在给张元济的一封信中,严复曾这样写道:“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羸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2][14]}这些文字正充分体现了严复的翻译目的。

林纾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与王寿昌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取得成功之后,他带着明确的翻译目标,开始了自己的翻译事业。林纾相信小说能改变人的思想,认为翻译小说是救国的一个很好方式。在《雾中人》的译序中他曾这样评论:“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则肆其力以译小说。”^[2]在《黑奴吁天录》的《跋》中他写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3]通过阅读林纾的小说,当时的中国人了解了西方的文化习俗与精神文明,并开始自我反思。

二、对原著选择的影响

很明显,译者在选择待译作品时不仅仅只会考虑到原著的文学魅力,而会选择与译入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作品进行翻译。严复精通中国古典文学也对西学很有研究,他共翻译了11部作品,而每一部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为唤醒当时的中国人,他第一个系统地引进西方哲学。

1898年,严复选择了赫胥黎的《进化与道德》而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行翻译,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当时的中国人所需要的是革新的思想,而非生物科

学方面的知识。因此,他吸收了赫胥黎的人类决定论,引进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加入了自己的很多观点,从而形成了《天演论》。在书中严复推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等观点,使当时的中国人意识到如果不起来斗争,将沦为西方列强的奴隶。1901—1902年严复翻译了《原富》,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并一步步走向富强的过程。这是第一本系统地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书,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严复的《穆勒名学》则将形式逻辑这一全新的科学译介给了中国人。

林纾并不懂英文,但他擅长古文,因此,他的翻译都是在与别人的合作下进行的。林纾共翻译了180多本外国文学作品,其中23部是哈格德所著,7部是柯南道尔的作品,5部是狄更斯的作品。为什么他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选哈格德是因为他的作品多为浪漫的爱情故事,与中国的传统小说相似,也容易为读者接受。如《双雄较剑录》中男主人公凭借着勇气与机智救回了自己美丽的未婚妻,这正类似于中国传统故事中的“英雄救美”。柯南道尔是一位侦探小说家,而侦探小说以其激动人心的情节,紧张的气氛和神秘的背景吸引着众多的读者。这虽与《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当中的浪漫爱情故事截然不同,但却与公案小说有着某些类似之处,大多以惩治罪恶,伸张正义为主题,而这一点正是林纾所想表达的思想之一。同时,林纾翻译了5本狄更斯的作品,因为狄更斯的小说大多反映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而且揭露了很多罪恶现象,这正与林纾希望通过改革来消除社会罪恶的观点相一致。

三、对译作中古文使用的影响

严复与林纾在其翻译作品中都使用了高雅的古文,而这是他们在当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与诗学观的影响下所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正如勒弗菲尔所说:

“语言代表着一部文学作品的特征。”^{[4][32]}

严复在其翻译作品中使用的是汉代以前的文字和语法形式。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曾批评严复的语言过于儒雅,不适合当时的人民群众。但事实上,严复这样做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首先,是因为当时的文学规范。在中国,自唐朝以来,所有的正式文章都用古文来书写。直到19世纪,古文在中国的文化多元系统中仍然占有很高的地位,文人们也都擅长于写古文,且看不起用通俗文字所写的作品。其次,

这是由严复的目标读者所决定的。他的目标读者是光绪皇帝，士大夫阶层以及那些受过教育的文人们。正是以儒雅的古文作为华丽的外衣，他在翻译作品中所倡导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理论才得以被这些读者们所接受。第三，这是由严复的赞助人吴汝纶决定的。赞助人是影响翻译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可以有力地促进他认为优秀的翻译作品的传播，也可以有效地阻止他认为不合时宜的翻译作品的出版与发行^{[4]19}。严复曾试图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阶层，但屡屡失败，于是，他明智地选择了吴汝纶作为他的赞助人来提升自己在文学圈中的地位，从而有利于他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的传播。吴汝纶是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文学界已久负盛名。他擅长于中国古典文学，也对洋务颇有兴趣。吴汝纶是《天演论》的第一位读者，他很喜欢严复在书中优美的措辞及表达方式。在序言中，吴汝纶写道：“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5]虽然吴汝纶主要称赞的是严复的措辞而非书中进步的思想，但他的这些评论却有力地提高了严复在文坛的地位，也大大促进了严复作品的传播。

同时，林纾也选择用古文来翻译，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首先，林纾本人非常爱好古文。从小他就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如《史记》等很感兴趣。通过多年的刻苦学习，他成为了一位古文专家。其次，因为林纾的大部分翻译作品都是小说，而小说在当时是被认为粗俗文学的。因此，林纾所用的儒雅的古文正如给他的翻译作品穿上了一件华丽的外套，也为他作品的传播铺平了道路，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当然，林纾在其作品中所用的文字是有别于桐城学派的，他的语言比较通俗易懂一些，而这也因为林纾的目标读者不仅仅只是士大夫阶层，还包括妇女和小孩。

四、对翻译技巧运用的影响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严复与林纾的翻译都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在翻译中他们任意删改或添加信息，从而给作品打上了强烈的个人印记。为什么他们会对其翻译作品进行这样的操纵呢？正如勒弗菲尔所说：“译者总是会根据译入语的文化规则重置原文，以确保译文被目标读者接受，有利于翻译作品的传播。”^{[4]26}

1. 增词法

严复在其翻译作品中添加了大量的注释，以解释

文中的难点或发表自己的观点。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添加了很多斯宾塞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解，如在第一章中严复写道：“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5]3}这里，严复引用斯宾塞的话来强调“变化”这一概念，同时也告诉当时的中国人不要死守着传统的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而应通过改变求得生存与发展。又如严复所说：“故用天演之说，竺乾，天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5]58}这里，他添加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以说明超自然的观念，也为其后的进化理论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严复的翻译中注释占了约十分之一的篇幅，达到170 000字。

同样，林纾也运用了这一翻译技巧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可确保读者对其译文的理解。如中国的传统小说都是章回体，且以时间发展为顺序，而西方小说中却有很多倒叙、后续等，在《块肉余生记》的第五章中林纾解释道，西方作家在写小说时总是把后发生的事情写在前面，这是出于不同的写作技巧，但可能会使中国读者感到困惑。因此，在翻译时林纾常常改变原文的写作顺序，以确保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又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林纾写道：“余闻言怒形于色，因忆漫郎与德习恺而诋他人腰缠，为男女行乐之地，丑行贻在人口，余岂屑之。”^{[2]126}这里，林纾加了“丑行”二字以表现他对于女子卖淫行为的不满。

2. 删减法

翻译过程中，严复与林纾在认为必要时删除了很多原文的信息。如严复的《天演论》仅仅只是赫胥黎《进化与道德》的一个章节，其余的部分都被删除了，因为赫胥黎认为自然界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人类社会却不是这样，这与严复希望中国人通过斗争赶走外国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观点相违背，因此，这些理论都没有出现在《天演论》中。同时，林纾也使用了这一方法。在《块肉余生记》的第一章中，狄更斯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医生的性格特征，林纾仅用了一句话概括：“医生平愧不忤人，亦不叱狗，名曰赤力迫。”^{[6]7}又如，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人物形象一般是通过对话或行为来表现的，而不会使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人物的衣着，因此林纾在翻译小仲马所写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将其用大段文字所描述的马克的衣着总结为：“御长裙，仙仙然描画不能

肖”一句话^[7]。另外,林纾所译的《黑奴吁天录》只有 92 000 字,而黄济中所译的有 340 000 字,因为林纾把章节中有关《圣经》宗教方面的内容全部删除了。林纾认为基督教只是帝国主义行善的幌子,他想阻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是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时代出现的特殊产物,在当时是进步的,对开阔国人的视野,解放他们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因此,不能因为他们的作品不完全忠实于原文,或他们在作品中使用了古文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简单的批判,只有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代背景才能准确地理解他们的翻译并给予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 Hermans Theo.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985.

- [2]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3] 林 纾, 魏 易. 黑奴吁天录[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1981.
 [4]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Routledge, 1992.
 [5] 严 复. 天演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6] 林 纾, 魏 易. 块肉余生记[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1981.
 [7]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8] 谭晓丽. 简评《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兼谈引进西方理论与译学创新[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4): 112-114.

责任编辑: 黄燕妮

(上接第 82 页)

- ② 参见 Laurence J C Ma. Anti-Urban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 1976; R.Murphey, Chinese Urbanization under Mao, 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Vol. 11, 1976; C. P.Cell, De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Urban-Rural Contradiction, Bulletin,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No.1, 1979.
 ③ 参见 Kirkby J R.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Vitor F.S .Sit, edt, Chinese City: The Growth of Metropolis since 1949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Rhoads Murphey. The Fading of the Maoist Vision: City and Country in China's Development, Methuen,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1980.
 ④ 参见 Michael Lipton.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A Study of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⑤ 参见 Vitor F S Sit. Chinese City: The Growth of Metropolis since 1949[M]. P25.然而,有学者认为城市居民也是这一时期工业化战略的牺牲者,参见 Wen H. Kuo, Economic Reform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1989, 62(2).

参考文献:

- [1] Kang Chao,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Housing in Communist China[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6, 25(3).

- [2] Kirkby J R.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PI-Chao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 No.3, 1972.
 [4] Laurence J C Ma. Anti-Urbanism in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8).
 [5] Rhoads Murphey. The Fading of the Maoist Vision: City and Country in China's Development[M]. Methuen,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1980.
 [6] Li Zhang. China's Limited Urbanization: Under socialism and beyond[M].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4.
 [7] Yuting and Fulong Wu, The Stat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M].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06, 40(2).
 [8] Kam Wing Chan,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and Urban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1949-82[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2, 16(2), .
 [9] Peter Nolan, Gordon White: "Urban Bias, Rural Bias or State Bias?Urban-Rural Relations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84: 20(3).

责任编辑: 李东辉